

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外交战略走向刍议

关贵海

虽然人们习惯于把俄罗斯外交概括为“双头鹰外交”或“大国外交”，但事实上，在俄罗斯至今仍没有一个一致、明确和完整的外交战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角色，无法确定自己在21世纪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战略目标；第二，频繁政府人事更迭、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政治风波等内部因素严重妨碍了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此情况下预测俄罗斯的外交战略走向，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儿。

尽管如此，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俄罗斯国内各方力量对本国所拥有的资源、在未来世纪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同世界主要力量中心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看法或认识的。所以在非常相对的意义上，可以把俄罗斯下一个世纪外交战略基本走向归纳为：继续追求世界大国目标，但侧重点和方法已有所改变，即，从把美国当成主要的战略伙伴转变为视其为主要对手，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政治资源和军事实力，最充分利用同欧洲和东方大国的伙伴或战略协作关系，与美国一争高低。

一、20世纪最后十年俄罗斯外交回顾

1991年7月，叶利钦向西方的朋友们表示：“俄罗斯作出了最终选择。它不走社会主

义道路，不走共产主义道路，它要走美国和其它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文明道路。”^[1]当然，不止是叶利钦一个人这样想。新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基本上都具有明显的亲西方首先是亲美的倾向。90年代初，许多俄罗斯人以为，只要自己公开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就会被张开双臂等待着的“文明民族大家庭”所接纳，就会迅速变成第二个富裕的“美国”。

但是，很快人们就明白了，要变成第二个“美国”，仅仅放弃社会主义是不够的。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的反对“世界共产主义”和“苏联极权主义”斗争，实际上就是在反对作为世界大国的苏联，因为只有这个国家能够联合其盟友同西方阵营对抗。所谓的反共宣传，西方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自己几乎都不再相信了。由此也使人不会感到奇怪的是，在俄罗斯宣布抛弃社会主义原则、承诺奉行民主、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后，西方世界在以物质援助回报新的“志同道合”者方面，却没有什麼“热情”举动。它们期望的只是对手被打倒，并成为其俯首贴耳的小伙伴。至于在什麼颜色旗帜下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并不是那麼重要。于是，当俄罗斯对小伙伴角色和西方援助“口惠而实不至”的作法稍有怨言时（在1993—1994年间），西方的战略家们就暗示俄罗斯，“文明民族家庭并没有期待它的加入”，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俄战略伙伴关系“为时尚早”。^[2]

更让俄罗斯生出难以下咽的恶气的是，在苏军完全撤出东德和其它东欧国家以后，西方政治领袖们所谓“诚实绅士”的风度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初正是他们对戈尔巴乔夫信誓旦旦，说什么北约绝不会向俄罗斯的边界推进；而如今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已经“荣幸”地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而且，执着地站在北约的大门外排队的仍大有人在，其中除固执的波罗的海三国以外，还有俄罗斯昔日“忠实的朋友”（如保加利亚）。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也犯了一些致命的错误：如，不仅自己曾表示准备加入北约，并且公开声称无意阻拦东欧国家加入；又如，1993年的白宫事件和1994年12月爆发的车臣战争使西方世界和东欧各国关于“俄罗斯威胁”的意识更加具体化。这些错误给北约东扩制造了客观依据。

当然，最令俄罗斯人震惊的还是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事件。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该事件是两个历史时期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冷战后过渡时期的终结，并把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从假定式（即把不可能实现的与西方毫无冲突的伙伴关系假定成现实）变成了叙述式（北约完成东扩第一步并在军事行动的基础上抛出战略新概念的活生生事实）。^[3]科索沃危机使冷战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冷却到了最低点。

与逐渐走下坡路的俄罗斯同西方关系相比，它同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在最近的5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最高目标是1998年12月普里马科夫访印时提出的“中印俄战略三角关系”。

总之，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的外交已经走上了一条从单边伙伴向多边伙伴调整和修正的道路；同时由于缺乏非常明确的战略，俄罗斯还是在走一步，看一看。

二、21世纪俄罗斯外交理念

一个国家外交思想的核心，应该是对自己国际地位或角色的认识。俄罗斯现在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说其经济千疮百孔实不为过。然而，这样一个衰弱的国家，在国际上依然追求着大国梦，奉行着以强国意识为基点的外交和国际安全政策。俄罗斯认为，“出于经济的原因而放弃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利益，那将是一个大错误。”^[4]在俄罗斯人看来，尽管目前它的经济处于非常衰弱的状况，尽管“经济和政治在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关联的。但是，造就成一个世界大国的不仅是经济。它还包括一个国家的幅员、它的人口数量、军事实力、文化、历史、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因此，“俄罗斯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个世界大国，将在国际政治中起明显感觉得到的作用。”^[5]这就是俄罗斯对自身国际地位的基本认识。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叶利钦在科隆八国首脑会议上提出了建立21世纪国际关系新构想的各项原则。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1999年6月25日在《独立报》（俄）上发表题为《变化世界中的俄罗斯》的文章，对这些原则作了进一步阐明。俄罗斯的主张是：第一，必须建立多极世界，因为只有多极原则基础上才能保证国际稳定并不断推进民主的发展。第二，联合国的作用不可替代，只有它才享有批准以国际社会名义对某个国家采取强制行动的特权。相反，以人道主义干涉权为借口、不经国际社会授权就随心所欲地判定孰是孰非或决定如何惩罚肇事者的行为，是导致世界无序和混乱的直接原因。第三，确保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体系的核心和坐标，并依照1999年5月7日布达佩斯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争取建立无分界线的大欧洲》，充分发挥欧洲委员会的作用。第四，在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坚

决要求维持本世纪最后 10 年建立的战略稳定结构和裁军成果的前提下, 恢复并加强同北约及美国的对话。

俄罗斯不能走向与西方的大规模冲突, 不能中断同国际金融组织, 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对话或联系, 这是一个大前提。在对美关系中, 俄罗斯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不可挽回的僵局; 在对其它在科索沃危机中表现突出的西方大国关系中, 也是有选择地采取了一些抗议性行动, 如伊万诺夫外长推迟访问伦敦等, 但并不真正意味着俄罗斯继续和加深同这些国家交往的路线有所改变。相反, 它必须搞清对欧洲政策的尺度, 因为受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和宣传战的影响, 俄罗斯对单个西方国家的具体立场了解得并不清楚, 而这一点关系到将来俄罗斯是否可以确定“欧洲一致性”方针, 明确解决一直困扰俄罗斯人的“欧洲还是美国”(与谁建立特殊伙伴关系)的问题。同时, 俄罗斯还将在不彻底否定现存裁军和武器控制体制的基础上, 推出新的欧洲安全体制原则。这种体制既要有政治上的原则性(非对抗), 又要有技术上的可行性(低成本), 并能够从进攻性和防御性两方面, 分别对在科索沃事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模糊或错误的认识和理解予以纠正, 以正视听。

科索沃危机使俄罗斯深切体会到, 国际法原则面临严重威胁, 二战以来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秩序日趋瓦解。而这两点对俄罗斯来说都是灾难性的。所以, 俄罗斯把自己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寄托在联合国安理会上, 阻止建立以借口人权等问题随意干涉别国内政为基础的所谓国际关系新体制。在这方面, 俄罗斯认为中国和印度是自己的坚定的同盟军。

按照传统的理论, 国际社会中存在两种类型的角色: 一种是保守型, 即竭力维护现状; 另一种是“革命型”, 即力图打破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讲俄罗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

守派, 处于明显的守势, 而美国为首的北约则充当着国际政治“革命性”变革的“激进派”, 处于明显的攻势。我们暂不评论两者谁对谁错, 只是应该指出, 俄罗斯还没有准备好适应这种变革, 但 20 世纪的模式毕竟带不到 21 世纪去, 与其被人“逼宫”, 不如自己思变。

首先是角色变换的问题, 即在新的国际关系体制中, 俄罗斯到底应该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这个体制带有鲜明的寡头政治特征, 即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能够参与有关全球事务的重大决定, 那么俄罗斯第一反应就是非常在意自己到底算不算这个“极少数”中的一个。20 世纪末的若干事件, 特别是科索沃危机证明, 俄罗斯已经被列在“二流”, 甚至“三流”。

那么, 俄罗斯在国际政治的金字塔中到底能爬多高呢? 向人哭诉“俄罗斯是一个世界大国”, 不仅不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相反只能败坏“世界大国”称号的荣誉。道理很简单, 俄罗斯缺乏足够的现实手段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大国身份。对俄罗斯来说, 比较实际的选择有两个: 一是承认现实并尽力去适应它; 二是向西方“老爷”们提出挑战并迫使他们把俄罗斯的话真当回事儿。这两种选择并不完全对立, 如果外交艺术到家的话, 甚至可以同时使用。

第一种选择实际上是主张俄罗斯同今天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强者联合, 尽管联合的性质很可能是俄罗斯屈居二流或三流。虽说这不合俄罗斯人的愿望, 但毕竟实用主义要高于恩怨意识: 跟庞然大物在一起总比站在小矮人堆里要强得多。^[6]需要强调的是, 这种理智的观点在今天的俄罗斯没有很大的市场, 因为俄罗斯人从心底感到难以忍受北约朝他们的脸上吐唾沫, 而他们又不得不强忍怒火是因为需要西方的贷款等支持。

第二种选择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实现, 如同中国和印度拉近乎, 在独联体基础上建立

新的联盟或支持反西方的国家等。实现这种选择时必须明确的是不能突出使用武力的色彩。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北约对南斯拉夫动用武力的结果是走进了死胡同,所以才需要俄罗斯的调解。但这是对西方讲话时的语气。当涉及到自身时,俄罗斯则得出不同结论: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人就是因为塞尔维亚势单力薄,而且北约不把俄罗斯的立场当回事儿也是出于同样原因。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再谈什么国际政治中的公正和和平,干脆也集中一切力量保障自己也拥有相应的军事实力。

在此背景之下,俄罗斯开始修改军事学说和军事战略。其中主要的变化是:扩大军费开支;集中力量发展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包括从军事的意义上利用宇宙空间;提高核武器的作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以抵销北约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白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特区及海军舰艇上部署战术核武器;拒绝在战术核武器问题上单方面承担任何义务;重新考虑所有军控条约;在军事学说中明确指出“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方”。^[7]

俄罗斯认为,鉴于自己常规武装部队的软弱,核压力将再次变成有效的政策工具,前提是核打击威胁能够变成现实。由于全面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核威慑理论的有效性已经非常有限,因为“没人相信有谁会使用核武器”,结果,苏联时期花费上千亿美元建立的核盾牌成了一堆无用的令人烦恼的废钢铁。俄罗斯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对世界上任何军事目标进行低能量“高命中精度”的核打击,而且,这种核打击并不会立即导致全球核战争的爆发。1999年4月29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已经决定研制相当于几十吨到100吨TNT当量的低能量、非战略性的、“可使用的”核武器。^[8]10月5日,安全会议批准的《国家安全构想》再次确认了这个目标。此外,针对美国正在研制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俄罗斯已经研制出可以躲避敌人防空系统的高精确度航空炸弹。

俄罗斯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还将出现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俄罗斯出于所谓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束缚而对采用武力还是比较谨慎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它已经不必再看西方的脸色,只要它认为事态发展到对俄罗斯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时,就可以像北约一样不经过任何国家或组织的许可便动用武力。俄罗斯军队毫无顾忌地开进车臣“剿匪”,便是实例。

由于俄罗斯国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很难准确预测其具体战略方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现实主义原则将占上风,也就意味着俄罗斯既不会与东方(主要指中国和印度)也不会与西方打成一片,也不会走向孤立主义和闭关自守的政策。

三、对外关系主要方面的政策

首先是与欧洲及北约的关系。西方国家在科索沃危机中的所作所为,再清楚不过地向俄罗斯人证明,他们关于欧洲将会以北约为核心的担心绝不是毫无依据。在新世纪如何处理同北约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比较简便的作法是退出1997年的俄罗斯与北约关系政治宣言,彻底断绝同北约的一切关系。但这会引发新的对抗,不符合俄罗斯社会转轨的实际情况。而且,俄罗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科索沃之后,北约已经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架构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力量或部分,在这样一个组织中没有俄罗斯的代表,没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制,也未必符合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鉴此,俄罗斯可以采取的步骤是:大幅度降低同北约关系的水平,但避免彻底断裂,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换言之,虽然俄罗斯亲西方政治家们所梦想的以“俄罗斯—北约”轴心为基础的欧洲安全架构,已是“海市蜃

楼”，但发展同北约关系的前景依然存在。相信与北约关系前景的俄罗斯人推断，北约各国并不是一群战争狂控制的国家，他们也不能不适当顾及反对自己的力量，所以在对南斯拉夫狂轰乱炸后的一段时期内，北约在东扩问题上会稍有所收敛。

俄罗斯欧洲外交战略的一个非常关键部分是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它希望该组织将来能够成为欧洲政治关系中的主导力量。自1993年北约东扩的鼓点儿敲响以后，该组织便成为俄罗斯用来遏制北约的主要砝码。在科索沃危机中，该组织所起的作用离俄罗斯所期望的相差很远，但毕竟它参与了危机的调解过程并将在巴尔干地区的战后重建中起突出作用。退一万步讲，对俄罗斯来说，只要不让北约独自指手划脚就是胜利。

俄罗斯把对北约的强烈反感集中在美国身上，在对欧洲伙伴的态度深感遗憾的同时，认为，欧洲只是被美国所胁迫，给美国人当了“垫脚石”，所以他们自己也感到有些不舒服。^[9]因此，俄罗斯仍然寄希望于与欧洲重新接近，而且觉得现在这种机会比冷战时更充分，因为欧洲已经不必担心莫斯科对自己的侵略，也就是不必依仗美国保护自己。于是比美国更文明而且不倾向于随意在大陆动用武力的欧洲将会对美国产生厌恶感。由此可以断定，俄罗斯将会把自己的外交战略重点更加倾向于欧洲。这恰恰既符合团结国际格局中的二流力量对抗美国建立单极世界企图的战略原则，又顺应了60—70年代苏联利用“大西洋两岸矛盾”的外交传统。

其次是对美政策。目前俄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1997年叶利钦同克林顿在赫尔辛基会晤时还能感受一点点“蜜月”滋味的話，走向21世纪的美国将不会再和俄罗斯“眉来眼去”，等待俄罗斯的是美国外交中根深蒂固的“世界优势”战略，即，美国为了控制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在世界上建立压倒任何力量的优势，且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

事等领域的优势，至少可以使它在20年内保持世界绝对领袖的地位。^[10]为了把绝对优势充分反映到自己的利益中，美国在东欧、独联体采取了一系列让俄罗斯恼火的行动：北约东扩、拉拢乌克兰和阿塞拜疆、“引诱”中亚各国，通过北约面向21世纪的战略新概念等。对于俄罗斯而言，美国的这些做法是在全球、地区和周边三个层次上^[11]遏制它，结果将是俄罗斯丧失土地、朋友、资源，并被围困起来，直至被困死。

至此，俄罗斯对美国的信任资源已经接近枯竭。它认为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独霸世界。今天美国可以教训伊拉克或南斯拉夫，明天可能就该轮到莫斯科了，理由也许就是“俄罗斯不够听话”等等。在这种外部压力之下，俄罗斯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情绪不断膨胀，极端势力夺取政权或国家陷入混乱局面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和欧洲盟国的安全，对类似危险非常敏感，于是自觉不自觉地又强化了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结果，俄美关系将会进入一个怪圈：一方加强遏制对方的依据都是因为担心对方的威胁。

由于俄罗斯在经济上，特别是资金方面严重依赖美国和西方，所以，即使对美国有诸多的不满，但是为了国内的政治和经济稳定，还必须通过牺牲一些局部利益来发展俄美关系。此外，俄罗斯国内有相当强大的势力支持加强对美关系。这些人认为，美国虽然不是一个理想的超级大国，但是一个俄罗斯已经研究透了并且可以预测的国家，它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正义感”。^[12]

再次，是对华政策问题。俄罗斯的专家学者大多认为，俄罗斯不应该片面地在“欧洲还是亚洲”的问题上作出选择，更不能仅仅从抵御美国压力的意图出发理解俄罗斯的东方政策，俄罗斯应该选择多边伙伴战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稳定性和建设性。在这个多边伙伴关系模式中，中国和印度占有特殊地位。

俄罗斯人对中国最基本的认识是，中国比俄罗斯更有可能成为世界大国，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俄罗斯的两倍；中国人具有同俄罗斯人一样坚定而强烈的大国意识；中国是俄罗斯注定的邻居和伙伴。

俄罗斯认识到，中国决不会同意某个国家的霸权，并将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争取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 21 世纪的前 50 年中不会改变。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强化中俄双方全面互利信任合作关系的大好时机。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的牢固的伙伴关系极其重要，因为，第一，这种伙伴关系从心理上可以弥补俄罗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劣势和在亚洲的脆弱地位。两国都致力于多极世界结构，不接受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都主张维护联合国、安理会的权限，捍卫国际法的尊严。此外，借助与自己共同边界漫长的中国，俄罗斯不仅可以稳定住甚至可以加强自己在亚洲的“软肋”。目前，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唯一一个让俄罗斯有可能提高自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地位的场所。第二，中国还是俄罗斯高技术产品，包括军事技术产品的理想市场，而这些产品在西方国家是很受排挤的。中国现在从俄罗斯购买的武器比俄罗斯军人购买的还要多。最令世界关注的是，俄罗斯最近向中国出售 40 架总值约为 20 亿美元的苏-30MKK 飞机，并提出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的建议。

在未来世纪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发展的因素：第一，俄罗斯对中国迅速强大带来的后果的顾虑。人口最多的中国同幅员最辽阔的俄罗斯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国际威望都处于上升阶段，而俄罗斯却面临着其历史上最为严峻的时期。^[13]如果中国国力继

续增强，而俄罗斯不断削弱的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任何举动，都会令俄罗斯心生疑惑。俄罗斯最怕中国的两个方面，一是强大以后会将自己多余的人口疏散到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因为在俄罗斯还残留着傲慢而谨慎地对待中国的态度，这是沙皇和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遗产”；二是中国将控制中亚地区并明确将其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二，两国对多极化含义的不同理解。按中俄对多极化的理解即意味着反对美国主宰世界，目前有能力遏制美国主宰世界企图的大国只有中国。既然俄罗斯接受不了从超级大国退化到美国的小伙伴的现实，那么万一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主宰，俄罗斯是否能忍受昔日社会主义“小兄弟”对自己指手划脚呢？^[14]

第三，虽然中俄两国表面上对很多问题（如台湾、车臣、北约、美国及经贸互补性等）的官方立场基本一致，但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深层内涵及在本国利益中主次顺序的理解，则有重大区别，这将是两国之间产生龃龉的诱发因素。

俄罗斯方面认为，其对华政策在近几年发生了真正积极的进展。但是，轰轰烈烈的政治宣言至今缺少相适应的具体步骤，结果其分量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中俄的战略协作关系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它在国际关系进程中的实际意义和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从真正的战略意义上讲，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从科索沃危机爆发后才刚刚开始。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倒是具有更强烈的战略合作色彩。对此俄罗斯的感觉是酸溜溜的：它实际上更希望俄美关系、俄中关系达到同样高的信任程度，并均高于中美关系。^[15]

因此，中国不应该为“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中俄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中俄之间没有政治矛盾”等礼貌用语所陶醉，必须清醒认识到，中俄的睦邻友好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能对两国长久、有效的战略合作抱过高

期望。因为说到底，在 21 世纪前 20 年，只有美国才有实力确定国际关系的总体框架和气候，只有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投资能够帮助俄罗斯完成社会经济转轨、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俄罗斯最终是恨美国却又离不开美国……

总之，“东张西望”将是 21 世纪俄罗斯外交走向最形象的特征。

注释：

- [1] [俄] 爱·巴塔洛夫：《“文明世界”的幻影》，载于《自由思想》杂志（俄）1999 年第 5 期，第 33 页。
- [2] [美] 兹·布热津斯基：《为时尚早的伙伴关系》，载于《政治研究》杂志（俄）1994 年第 2 期。
- [3] 详见《科索沃冲突：形成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新背景》，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同名研讨会论文集，1999 年，第 4 页。

- [4] 见德国《明星》周刊 1999 年 7 月 29 日，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答该刊记者问。
- [5] 同注 [4]。
- [6] 同注 [3]，第 27 页。
- [7] 同注 [3]，第 29 页。
- [8] 参见《参考消息》，1999 年 5 月 21 日。
- [9] 同注 [3]，第 25 页。
- [10] [俄] 阿·乌特金：《美国 21 世纪的战略》，载于《美国》周刊（俄）1999 年第 7 期。
- [11] 参见孙希有：《俄美关系中的三大利益冲突》，载于《参考资料》1999 年 8 月 16 日。
- [12] [俄] 叶·巴扎诺夫：《迈向 21 世纪的国际关系发展趋势》，莫斯科：“学术书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21 页。
- [13] [俄] 阿·乌特金：《美国 21 世纪的战略》。
- [14] [俄] 阿·沃兹克列夫斯基：《俄罗斯外交政策面临选择》，《自由思想》杂志（俄）1999 年第 5 期，第 49—51 页。
- [15] 同注 [14]，第 54 页。

科研简讯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一书出版

我院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的《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于 1999 年 9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册，共 96 万字。该书既是一部学习和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的教材，也是一部专著。该书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实事求是地分析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格局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力求准确、科学地揭示这一时期的风云变幻、扣人心弦的历史进程。该书在体例上主要按编年系统撰写，共分 6 编 23 章，既反映战后国际关系史的连续性，也呈现一定的阶段性。书中依据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原始文件，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一些国家陆续公布的解密档案材料，同时该书也利用了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一些新材料，并参阅了大量中外书刊。为了方便读者，该书在书后附录了 1945—1995 年苏联、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历届政府更迭表、大事年表、外国人名译名对照表和外国地名译名对照表。

（左 哲）